
18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

赖元晋

18世纪的启蒙史学，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前半期在西方屡遭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否定、抨击和嘲讽。20世纪兴起的“批判历史哲学”诸流派也对它大加挞伐。直至近40年来，随着西方史学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当代许多新颖的历史学观点，启蒙学者早已提出并曾运用于研究。启蒙史学因而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代表勒高夫将西方现代“新史学”的出现追溯到启蒙运动，说“伏尔泰已确定了新史学的大纲”^①。有的史学家承认，“近代的历史科学观念起源于启蒙时代”^②。不过，当代西方学者对启蒙史学的肯定，大多出于宣传现代“新史学”的需要，而启蒙史学的许多精华却被否定或遗忘。因此，深入探讨和详细阐述启蒙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世界史学发展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是在同封建教会史学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的。18世纪的启蒙史学，批判地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进步史学的宝贵遗产，创立了新的历史哲学，对后来的资产阶级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第一次挣脱中世纪的精神枷锁，抛弃基督教神学历史观，以复兴古典史学的形式，开辟了西方史学的世俗化进程。人文主义史学注意革除中世纪史学的编年史体例和粗俗、干瘪的文风，形成了按重大时期组织史料进行夹叙夹议的近代史学体例和生动活泼的文风。人文主义史学确实带有近代史学的某些特征，可以说跨出了迈向近代史学的第一步。但是，近10年来我国发表的某些史学史论著，简

① L·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② G·C·伊格尔斯：《欧洲史学的新方向》G·C·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1975, 第13页。

单地将人文主义史学认定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却未免过高估计了人文主义史学的发展水平。当时的资产阶级尚未从一般城市市民中分化出来，政治上非常软弱。与此相适应，人文主义者大都在罗马教廷或城市贵族荫庇下从事创作，只是以歌颂现世生活和漠视神学教条的形式表达他们的世界观，并没有公开地打出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人文主义史学家过于崇拜古典文化，对古代著作中的宗教迷信深信不疑，因而不能将反宗教迷信的斗争深入到底。人文主义史学家还欣赏和模仿古代罗马史学的修辞学文风，片面追求史学的艺术效果，偏爱描写战争、政治纷争的有趣情节，不大注重史实真伪，不愿研究历史理论问题，没有形成与神学历史观相对立的历史哲学。17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史学专注于修辞学的倾向日趋严重，终使它走向衰落。因此，这种史学始终只停留在近代史学的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真正的近代史学^①。

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封建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提高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教会的民族化激发起各国的民族意识；宗教战争和没收教产使寺院珍藏的大量历史文献流入俗界学者之手，这一切都有利于近代史学的成长。然而宗教改革对近代史学的成长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新旧两教派的论战都利用历史来证明本派的教义符合基督教的真谛，致使宗教信仰问题再次成为史学的中心内容，神学历史观重新泛滥，文艺复兴时开创的史学世俗化过程遭到严重挫折。

教派史学在论战中注意引证历史文献来驳斥对方，从而把史学界的注意力引向文书考证方面。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在17—18世纪形成了所谓“博学派”史学。这派学者作了大量文书考据工作，形成了一系列考据原则，为近代史学做了史料批判方法的重要准备，从而把历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现代西方某些学者因此称博学派史学为近代史学的开端^②。但这仅仅是从史料批判方法的角度来判断近代史学成就的。博学派专注于中古早期文书考据，提倡“为研究而研究，唯一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的学风，鄙视叙述性历史著述，尤其拒绝写近世历史，将史学引向远离现实的象牙塔，而且在他们的考据中渗透着对中世纪制度和教会的景仰之情。这种史学本质上适应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需要，因而不能把它视作近代资产阶级史学。

就在博学派史学盛行的同时，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用新的宇宙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笛卡儿针对宗教迷信提出了理性万能、理性至上的口号；波当、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等人要求按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的模式建立“关于人的科学”。由此提出理性决定论、历史进步观、世界历史整体观等新的历史学理论^③。但是，这些被称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完

① 关于人文主义史学的痼疾，谭英华先生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一文有详细论述，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② 参见J·W·汤普逊《历史编纂学史》第2卷，纽约1942年版。

③ 关于这些历史思想，见谭英华《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

全脱离具体的历史,是按照几何学的方法,从一些公理出发演绎出来的。这些理性主义思想家大都对历史抱极端怀疑的态度,认为历史只是一堆真伪难辨的乱麻,人们无法对它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说明,现有的历史不过是后人的伪造。因此他们大都鄙视具体历史研究。个别学者,如格老秀斯虽写过具体历史之作,却没有运用新的历史学理论。可见,17世纪的理性主义只是为近代史学作了理论准备,也没有形成近代史学。

总之,到启蒙运动兴起时,人文主义史学因沉迷于修辞学而衰微,博学派钻进单纯考据的死胡同,掌握先进理论的理性主义者拒绝研究具体历史,由此形成先进理论与史料和修史三者脱节的局面,妨碍近代史学的最后形成。与此相反,17世纪末法国教会史家鲍绪埃在他的《世界史论》中却能将具体历史研究与神学历史观和理性主义论证形式结合起来,编织出空前庞大而周密的世界历史体系。该书成为18世纪前半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著作,成为资产阶级史学形成过程中的大敌。战胜封建教会史学并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坛的统治地位,便是当时进步史学家们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启蒙史学就是在这种史学环境中产生的。它在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归结起来就是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基本完成了战胜封建史学的任务。启蒙史学的历史地位就在于此。

启蒙学者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任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较正确地对待以往的成果,即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先进历史学理论和怀疑批判精神,抛弃了17世纪先进思想家对待具体历史的鄙夷和否定态度;重视历史研究,把历史当作反封建、反迷信斗争的重要武器。启蒙学者承袭了人文主义史学的世俗化方向 and 人性论思想,注意克服人文主义史学的浮华学风;他们注意利用较可信的史料和博学派的考据成果,坚决反对脱离现实的单纯考据,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孟德斯鸠批评博学派只是“微不足道的编书匠”^①。伏尔泰强调历史研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马布里则认为,历史是对公民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学校。启蒙史家在一定程度上把先进理论与史料和历史结合起来,产生出诸如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简称《风俗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大卫·休谟的《从尤利·凯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罗伯逊的《美洲史》和《苏格兰史》、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等一大批有较高学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史学名著。此外,孟德斯鸠、卢梭、杜尔果、马布里、孔多塞和百科全书派某些著作中也包含丰富的历史内容。正是这些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与封建教会史学相对立的新型史学的诞生。

^① 转引自E. 布雷萨克《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史学》E.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icago, 1983, 第209页。

二

现代西方一些史学家把启蒙史学称为新型史学^①。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它之所以成为新型史学,最重要的是,启蒙史家力图运用新的历史观来阐释历史,否定了单纯罗列史实的传统历史编纂学,要求建立“哲学家的历史”,第一次提出了研究历史哲学、探讨历史的内在联系、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任务。

启蒙史家大都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服从于永恒的规律,必然性统治一切,偶然性只是表现必然性作用的工具。伏尔泰写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协调一致的、有联系的、有制约的,……永恒的锁链不能扯断,也不能错乱,……必然的命运是整个自然界的规律”^②。孟德斯鸠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他写道:“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的,……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世界没有这些规律便不能生存”^③。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运用这一观点指出,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不能归咎于庞培、凯撒等人的个人野心和偶然机遇,而是“一般原因”,即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只有在积累了足以使共和国瓦解的一般原因时,个人作为一般原因的工具才会对共和国的灭亡起作用;偶然性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必然性的作用。历史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是启蒙历史学的最宝贵遗产。普希金因此而称赞道:“伏尔泰是将哲学的灯台带进昏暗的历史档案库的第一人。”^④

启蒙时代存在多种历史哲学,居主导地位的是以伏尔泰、杜尔果、休谟、孔多塞等人为代表的理性决定论。这种理论主张,人类存在普遍一致和永恒不变的理性,理性长期受情感、迷信、偏见和暴政等非理性力量的压制,致使人类长期处于野蛮愚昧状态。理性不断要反抗非理性的压制以获得解放,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理性解放的程度不同,便表现为历史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差异。这种理论实际上将理性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将人类历史说成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过程。理性决定论虽产生于17世纪,但到启蒙时代才发展成熟,并被运用于具体历史研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将千余年的欧洲史归结为不同思想的斗争,首先是基督教与古代宗教的斗争并由此形成罗马教皇和中世纪国家;接着是教权至上主义与皇权主义思想的斗争,并导致世俗皇权的衰落和教权统治地位的确立;然后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导致十字军东征的长期血战;最后是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造成天主教世界的分裂、民族国家的产生

① 布雷萨克《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史学》第13章的标题就是“启蒙时代对一种新型史学的探讨”。

② 伏尔泰:《哲学辞典·命运》。

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1961年版,第1—2页。

④ 转引自加尔金等《近现代欧美各国史学史》И.С.Тамкин и др.,Историкография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Европы и Америки, Москва, 1977,第28页。

和理性的黎明。这种历史观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这里，不同思想的斗争实际上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斗争，理性与非理性则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代名词。这较之教会史学所宣扬的上帝与魔鬼的斗争，包含了更为真实的历史内容，不失为近代历史学的一大进步。

理性主义历史观中最宝贵的是历史进步论。这种理论是同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悲观厌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颂古非今观念相对立的。它虽产生于16、17世纪，但遭到人文主义崇古论的激烈反对，曾引起一场古今优劣的论战。到启蒙时代，历史进步论才压倒崇古论而成为史坛的主流，并首次形成系统的理论。在这方面，杜尔果和孔多塞建树最大。杜尔果著的《世界史论》指出，人类是服从进步规律的总体；进步就是人性的进化和提高；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一切随着理性的运动而前进。他说：“人类虽然交替经历过安定与动乱、衰落与复兴、幸福与痛苦的时期，但总是以缓慢的步伐朝着更完美的境界前进。”^①这一名言集中代表了18世纪启蒙史学中的进步论。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中，对历史进步论作了系统、清晰的阐述。他认为，人类精神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必将从自然界和非理性社会的暴政下获得解放。孔多塞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十个不断进步的时代，理性时代则是历史进步的最高点。他确信，在经过许多世纪的摸索后，反抗谬误的力量已经找到，理性已开始其胜利的进程。孔多塞不是把这一胜利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是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将挣脱一切枷锁，挣脱偶然机遇的支配和进步之敌的桎梏，在通向真理、美德和幸福的道路上以坚定、自信的步伐前进。”^②

应该指出，在启蒙时代，历史进步论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反封建内容。启蒙学者从历史进步论出发，将中世纪的野蛮落后与近代的文明进步相对照，认为中世纪不过是历史进步过程的暂时中断。休谟指出，在中世纪“法律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强权和暴力统治一切”^③。杜尔果则把中世纪称为“国王没有权力，贵族横行无忌，人民遭受奴役，乡村饱经战火蹂躏，商业和交通被破坏殆尽，最粗野的愚昧无知遍及一切国家和一切行业”^④的时代。启蒙学者还把他们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渴望与历史进步理论联系起来。伏尔泰说：“进步是不能与商业繁荣和政治自由分割开的”。杜尔果则将历史进步看作物质福利、精神启蒙和政治自由三者的结合^⑤。

①④ R. L. 密克：《杜尔果论进步、社会和经济学》R. L. Meek, *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achussetts, 1973. 第41, 54—55页。

② K. M. 帕克：《孔多塞》K. M. Parker, *Condorcet*, Chicago, 1975. 第281页。

③ 休谟：《从尤利·凯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第1卷 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Vol. 1, London, 第216页。

⑤ 转引自R. 尼斯比特《进步思想史》R.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1980. 第177页。

孔多塞则认为，自由平等、政治开明、富裕、和平都是未来进步所不可少的条件。他预言，随着理性的胜利，文化教育将获得全面发展，人类福利将相应改善，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将被铲除，世界将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统治和奴役^①。总之，这种历史进步论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反封建精神以及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

启蒙时代还出现了一些不同于理性主义的历史观。首先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的地理史观。孟氏认为，由于气候、地形、土壤和面积等地理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各国、各民族精神的差异，进而引起了各国政体形式的不同，使它们走上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孟氏的这种理论曾遭到伏尔泰和休谟等人的尖锐批评。但实际上孟氏在强调地理环境的意义时，并未忽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精神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地理环境的作用只有通过人的精神的变化才能发挥出来。一些理性主义者虽然批评这一理论，却又程度不同地受到它的影响。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气候、政治和宗教持续不断地影响人们的意识，这就是解开世界之谜的唯一钥匙”^②。英国理性主义史家罗伯逊在《美洲史》中通过对美洲地理位置的分析，首次提出了美洲印第安人是远古时代穿过白令海峡经阿拉斯加进入美洲的亚洲人的观点，这一观点为后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可以说这是运用地理史观解释历史的一个成果。

卢梭不是历史学家，但也对西方近代历史学的产生作出重要贡献。他不是用理性受非理性的压制，而是用私有制的出现说明社会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并以种植业和冶金术的出现作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和产生私有制的前提，这里显然包含着唯物主义因素。卢梭指出，不平等的产生既是人类历史的退步又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既引起奴役和道德败坏，又使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他还认为，人类虽然经历了从原始平等到不平等，但终将从不平等转向更高级的、基于社会契约的平等的过程。这些闪烁着辩证法的思想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③。与理性主义者的历史进步论相反，卢梭歌颂原始状态而鄙视近代文明，甚至对科学艺术抱否定态度，认为它们的进步只能扩大社会不平等和加剧人的道德败坏，主张人类应回到自然状态中去，这种悲观复古的思想乍一看似乎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实际上是他已感觉到近代文明的内在矛盾，看到人类取得的文明成就只能为少数富人享受。卢梭的这一思想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现实的抗争，其思想发展水平比理性主义超出一个时代，卢梭因此成为近代浪漫主义

① 参见布雷萨克前引书，第208页。

② 转引自G. B. 布拉克《历史学的艺术》G. B. Blak, *The Art of History, A Study of Four Great Historia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26. 第45页。

③ 参见《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页。

历史哲学的先驱。

浪漫主义历史哲学是启蒙时代历史学的重大成果。它最早产生于18世纪前半期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维科。18世纪末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赫德尔将它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他在《人类历史哲学概论》一书中，集中表述了浪漫主义历史哲学的两个基本理论——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个体理论。首先，他批判理性主义对中世纪采取绝对否定的非历史倾向，进而把人类历史看作生物有机发展过程，认为每一历史阶段都是这一有机过程的不可少的环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不可割断的连续性。因此不能用某一固定的标准(理性)将某一时代(中世纪)绝对否定。应承认每个时代都对人类发展作出了贡献，否则人类历史将变得不可理解。第二，他反对理性主义的人性普遍一致的观点和将世界历史概念化的倾向，认为人性一开始就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民族特性产生出不同的文明，人类历史是由各个独特的民族个体和文化个体构成的，人类历史的进步并非沿着共同的路线和统一的模式，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和道路^①。这种浪漫主义理论虽然也是唯心主义的，但较之理性主义历史观仍是一大进步，它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启蒙时代在史学史上虽被称为理性的时代，但启蒙历史理论却不止一家，各种理论既展开尖锐争论，又相互影响和渗透，以致我们既找不出一个纯粹的理性决定论者和地理决定论者，也找不到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因为这些理论在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烈的反封建性。它们都从不同方面为新兴资产阶级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繁荣。

三

除建立新的历史哲学外，启蒙史学最突出的贡献是为拓宽史学视野、建立新的世界历史体系而作出的革命性尝试。这就是启蒙史家提出的文化史观。

自古代修昔底德以来，西方的史学视野一直囿于政治、军事、宗教领域，并局限于地中海地区和西欧的狭小范围。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大开眼界，有关描述新大陆、新民族和新文明的书籍风靡一时，其内容涉及各地的河海山川、民族人种、社会经济、历史轶闻和殖民者的活动，第一次突破了狭隘的政治史框架，并为史前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启蒙学者们在克服“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与地理大发现所揭示的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强调理性具有自我解放的力量力的同时，承认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对人类进步的作用，由此形成了由理性、风尚和环境三者结成的“文明”或“文化”

^① 参见哈多克《历史思想概论》B.A.Haddock,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Thought*, London, 1980, 第94—100页。

的观念。17世纪理性主义者已承认除欧洲文明外还存在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17、18世纪之交出现了要求按这种观念研究历史的主张。法国启蒙运动先驱者皮埃尔·贝尔和德·封特奈尔就呼吁历史家，研究各民族不同风尚的演变和“人类精神的历史”。费内隆也要求对社会制度的发展作更全面的研究^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启蒙史学家伏尔泰最先确定了写作文化史，即人类精神史^②。

所谓人类精神史并非狭隘的思想史，而是包括人类一切活动和成果的文明发展史。伏尔泰为这种新型史学规定了明确的目的和任务：“历史家的任务不是绞尽心思地去查明在野蛮荒谬的时代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是在哪一年接替了另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而是要用改变了一些国家的风俗和精神的历史变革来充实人们的头脑”^③。他还说：“我想要知道的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类型，人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创造的技艺。”他的《路易十四时代》虽然仍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内容，但却辟有专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社会经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章节，被后世誉为“第一部描述一个民族生活全貌的著作”。他的《风俗论》进一步摆脱了政治史框架和基督教世界的局限，试图从人类史和文化史的高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研究，这部书被后世赞为“第一部真正的文化史”^④，成为启蒙学者治史的典范。

启蒙史学的文化史观贯穿着对政治军事史的鄙视和对文化学术的高度赞扬。伏尔泰认为，战争和政治阴谋手段只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暂时作用的因素，它将被人们遗忘而从史册中消失，良好的法律和科学技艺的不朽成果却能与世长存^⑤。他甚至写道：“一座联接两个海洋的运河河闸、一幅沧桑的油画、一部优美的悲剧和一个新真理的发现都比所有宫廷实录和所有战争记述珍贵千百倍。”^⑥基于这一观点，伏尔泰把文化学术的盛衰作为评价历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世界历史上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这就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并表现出“人类精神崇高伟大”的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文艺复兴和路易十四时代，而且他不是以1643年路易十四的即位，而是以1635年巴黎科学院的建立作为路易十四时代开始的标志^⑦。

① 参见布伦菲特《历史学家伏尔泰》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Oxford, 1958, 第4页。

② 参见斯通编《史学集锦，从伏尔泰到现代》F.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Present*, New York, 1958, 第38页。

③ 伏尔泰：《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卷首语。

④ G. P. 古奇：《19世纪的史学和史学家》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13, 第573页。

⑤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2—493页。

⑥ 转引自布拉克前引书，第37页。

⑦ 参见《路易十四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不仅重视精神文化史,也注重物质文化史。他的《风俗论》一书既论述了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贵族和王权的起源,更广泛地涉及了意大利的早期城市及其同东方的贸易、英国与佛兰德尔的羊毛交易、中世纪欧洲币值的变化、15世纪以来的欧洲海外殖民及其对宗主国的价值、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而引起的价格革命等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并肯定了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该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十字军东征并非出于崇高宗教动机,而是出于劫掠的欲望,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革命和法国的福隆德骚动都部分出于经济的动因^①。伏尔泰甚至认为,使治国者认识经济财政在政治军事中的重大作用,是历史学的一大功用。他举例说:“伊丽莎白女王用以抵抗强大的腓力浦二世的唯一手段是英国的商业和灵活的经济,她的100艘用以抵抗无敌舰队的船只,有1/3是英国的商业中心提供的”^②。

伏尔泰的文化史观在启蒙时代影响很大,成为一股潮流。休谟指出科学和艺术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认为15世纪科学的太阳冉冉升起,才使欧洲脱离千年野蛮状态。他写的《英国史》中就有不少关于科学文化的内容。德国启蒙史家摩塞尔所著《奥斯纳布吕克史》,将德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放在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构成的总体中考察,认为历史的发展乃是各种经济因素与变化中的各个阶级相互作用的结果^③。德国艺术史家克尔曼写的《古代艺术史》一书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该时代整个文化的产物,因此只有研究艺术与同时代文化活动的联系,研究社会经济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该书主要论述的是希腊古代艺术,同时也广泛地论及了古代希腊的地理、人种、宗教、风尚、哲学、文学和政治等方面,首次将希腊艺术与希腊古代文明结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著作^④。

启蒙时代德国哥丁根学派历史家比其他德国历史家更推崇文化史观。该学派创始人伽特勒抨击了以往的史书只是罗列王朝的名称、诸侯的选举和各邦间的战争。他认为,“历史不只是君王们的传记或王朝更替、战争和战斗的年表”^⑤。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施洛泽尔明确地指出,世界史不应限于记述政治事件,不能以帝王世系为中心,单纯罗列人名、地名和年代,而必须记述文化的发展,研究人类的各种发明、发现以及它们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能展示人类的发展进程^⑥。

除了用文化史取代传统的政治史外,启蒙史家还试图将历史研究的范围从欧洲扩

① 参见布伦非前引书,第97页。

② 伏尔泰,《历史的功用》,转引自斯通《史学集锦》,第45页。

③ 参见汤普逊《历史编纂史》第2卷,第115—116页。

④ 参见汤普逊《历史编纂史》,第117—118页。

⑤ 转引自伊格尔斯《欧洲史学的新方向》第14页。

⑥ 参见巴特菲尔德《人类对过去的探讨》H.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1955,第49页。

展到整个世界。他们主张，应公正地评价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建立包括东方民族在内的新的世界历史体系。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是教会史家鲍绪埃在《世界史论》中提出的世界史体系，这个体系以上帝为世界历史的主宰，以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文明起源为世界历史的开端和中心，其范围限于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因此，要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就必须打破鲍绪埃的世界史体系，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伏尔泰。

伏尔泰历来把东方看作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对中国文明尤为景仰。《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专辟一章，驳斥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礼仪的攻击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热情赞扬中国的治国方略和伦理道德。《风俗论》则针对鲍绪埃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史体系。该书尖锐地指出，鲍绪埃的《世界史论》充满了“伪善、欺骗和谎言”；鲍氏“写作此书的唯一意图是要说明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犹太民族而发生的”；“这位雄辩作家在写到阿拉伯人时明知他们有强大的帝国和兴旺的宗教，却把阿拉伯人比喻为洪水猛兽”^①。伏尔泰还力图说明欧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东方文明发展起来的。因此，书中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的发展，如探讨了印度文明起始的时间和印度的人种风俗，论证了基督教神学起源于印度古代神话，分析了印度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等等。

《风俗论》一书对中国文明尤为重视。为了说明中国文明比犹太文明更悠久，该书头两章专写中国历史。其中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记述了中国的工商业和财政以及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演变，赞扬万里长城、天文成就和指南针的发明等。书中还以肯定中国的行政管理和科举制度来否定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混乱和贵族世袭制，以对儒教的宽容精神和仁义道德的赞誉来鞭挞基督教的偏狭和暴虐^②。该书记述的范围远达日本和南美印第安文明，充分表现出伏尔泰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只是由于当时欧洲史学界对欧洲以外的各国历史了解甚少，才使他对这些国家历史的论述缺乏准确性，以致明显地将中国封建制度和儒教理想化。尽管如此，伏尔泰大胆否定教会史学试图建立一套新的扩及整个人类的世界史体系，仍是难能可贵的。

伏尔泰的新型世界史整体性思想得到了哥丁根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施洛泽尔在《世界史纲》和《世界史演讲集》中，对18世纪前半期英国史学界集体编写的《从远古到现代的世界通史》38卷本巨著的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该书采用的分国、分地区的体系只能算是国别史的汇编，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他认为，世界史是一种新型的历史即人类史，人类本身是一个整体，世界史也应该具有整体性，这样才能说明整个人类的发展^③。施洛泽尔特别强调，世界史应该包括“世界上已知的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时期和一切重大事件”，“说明人类的起源、进步和衰

① 转引自布拉克前引书，第73页。

② 参见布伦菲特前引书，第77—80页。

③ 转引自巴特菲尔德前引书，第49—50页。

落”。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的人类史，才能“为心理学、自然科学、政治科学和其他一切学科提供例证”。施洛泽尔还指出：“研究世界史就意味着对世界和人类各次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联系进行思考，以便对今天的世界和人类有一个基本的估计”^①。

哥丁根学派还为重新确定世界历史的分期作出了贡献。对世界历史进行统一分期，始于罗马帝国末期的教会史学。这种分期主要依据圣经故事，如奥古斯丁根据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的故事将世界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奥罗修斯则根据《圣经·但以理书》中“但以理梦见海上先后涌出四个怪兽”的故事，将世界史分为四个帝国时期。此分期法在中世纪进一步完善而形成四帝国体系，即认为世界历史只经历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四个帝国，而中世纪则是罗马帝国的继续，从而抹杀了古代与中世纪的区别。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首次提出了“中世纪”的概念，人文主义艺术史家瓦萨里在《艺苑名人传》中将欧洲艺术史划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两大时期。17世纪末荷兰历史家凯勒尔著《世界通史》，以公元306年君士坦丁帝即位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两个事件为分界线，将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从而奠定了近代的“历史三分法”。但是这种分期法长期内仅被艺术史家采用，未能在世界通史中推广。宗教改革时期教派史家推行以一个世纪为一个时期的僵化的“世纪分期法”。鲍绪埃的《世界史论》则以9世纪查理帝国为界，将世界史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又根据圣经故事和希腊罗马的历史片断，将古代史划分为12个时期。鲍绪埃的历史两分法抹杀了中世纪与近代的区别，较之历史三分法是一大倒退。然而这种分期法却在18世纪十分流行。

哥丁根学派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重新采用了长期被埋没的历史三分法并作了一些革新。伽特勒不以君士坦丁帝即位和君士坦丁堡被攻陷这类政治事件为依据，而以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作为划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较之凯勒尔的三分法前进了一步。施洛泽尔继承了伽特勒的分期法。赫伦则更进了一步，他不以历史上的某个孤立事件为标志，而以15世纪末的一系列科学发明和发现作为划分中世纪与近代两大阶段的原则，从而突出了科技和经济变革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经过哥丁根学派的努力，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历史三分法在西方史坛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最后，启蒙史学家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提倡写作人类史、文化史，注重研究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与此相适应，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也做了较大的改进，即注意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概括、对比和分析，革除了传统史学单纯描述事件的陈规，将叙事与分析结合起来。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是第一部不着力叙述罗马历史过程，而对罗马社会进行分析的著作，虽然它的篇幅较小，却开创了近代史学采

^① 转引自汤普逊前引书，第123页。

用社会分析法研究历史的先例。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则以哲学家的眼光对中世纪欧洲和17世纪法国的大量社会政治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罗伯逊的《查理五世时期史》一书的导论，对欧洲千年中世纪史进行高度概括性论述，后世评论家认为，在对历史潮流进行精辟的概括方面，只有19世纪法国史学大师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能与此相媲美^①。

启蒙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很注意对不同民族、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罗伯逊在《美洲史》中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与多瑙河两岸的古代日耳曼人进行比较，指出了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广泛地比较分析了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几乎一切国家的地理环境、人的精神风貌、政体形式和历史发展，指出了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政体形式。由于他的分析是依据极丰富的历史材料，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所以后世学者认为孟德斯鸠是第一个对社会历史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人，是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先驱^②。此外，启蒙史家大多注重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注意分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理状态。由此我们看到了现代比较史学和心理史学方法的最初萌芽。

在史料的搜集、鉴别及运用方面，启蒙史学较之以往史学也有明显进步。伏尔泰为写作《路易十四时代》，参阅了约二百种历史文献。吉本为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研究了有关罗马帝国历史的几乎一切拉丁文出版物以及大量古文物、古钱币和碑铭。由于该书资料丰富、准确，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罗伯逊为写《美洲史》，亲自到美洲和欧洲各国(包括俄国)搜集资料，该书因而成为16世纪以来学术价值最高的有关美洲史方面的著作。哥丁根学派在搜集和整理史料方面贡献尤大，他们不仅注重研究古文书学、谱系学、纹章学、钱币学等，还提出了诸如手稿的校勘、原始版本的复原、史料真伪的鉴别和探源等一系列原则。此外还提出了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历史文书的任务，18世纪末德国语言学家沃尔夫在《荷马导论》中首次运用此方法，对荷马史诗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精辟分析，为19世纪盛行的史料批判方法开拓了道路。

启蒙史学虽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还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但它在历史哲学、历史学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终于创立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型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这种具有鲜明反封建性的史学不仅有助于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制度，而且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段启增)

[作者赖元晋，1936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布拉克前引书，第130页。

②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3页。